

【全新译本】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全新译本——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

——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

李修建 张云江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马克斯·韦伯著;李修建,张云江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2

(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ISBN 978 - 7 - 5004 - 7507 - 1

I. 新… II. ①韦…②李…③张… III. 新教—研究—西方国家
IV. B97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697 号

出版策划 曹宏举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石春梅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 960 1/16
电 话 010 - 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印 张 18.75
字 数 215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为了深入探究西方文明的渊源与演进，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反映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全新视角，展示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对西学的重新审视与诠释，构建全新的西学思想文献平台，我们组织出版了这套《西方学术经典译丛》（全新译本）。本译丛精选西方学术思想流变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传世名作，由多位专家学者选目，一批学养深厚、中西贯通、年富力强的专业人士精心译介，内容涵盖了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收录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载体的诸多经典名著。

本译丛系根据英文原著或其他文种的较佳英文译本译出。与以往不同的是，本译丛全部用现代汉语译介，尽量避免以往译本中时而出现的文白相间、拗口艰涩的现象。本译丛还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在译介理念和用词用语方面，基本采用改革开放以来西学研究领域的共识与成论。另外，以往译本由于时代和社会局限，往往对原作品有所删改。出于尊重原作和正本清源的目的，本译丛对原作品内容一律不作删改，全部照译。因此，本译丛也是对过去译本的补充和完善。

为加以区别，原文中的英文注释，本译丛注释号用①、②……形式表示；本译丛译者对原文的注释则以〔1〕、〔2〕……形式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By *Max Weber*

目 录

作者导言	1
------------	---

第一部分 问题

第一章 宗教关系与社会分层	16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27
第三章 路德的“天职”观(研究任务)	51

第二部分 苦行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

第四章 入世苦行主义的宗教基础	62
A. 加尔文宗	66
B. 虔敬派	99
C. 循道宗	109
D. 浸礼宗诸教派	113
第五章 苦行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124

注 释

作者导言	152
第一章 宗教关系与社会分层	153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160
第三章	路德的“天职”观(研究任务)	175
第四章	入世苦行主义的宗教基础	194
第五章	苦行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251

作者导言^{〔1〕}

作为沐浴着现代欧洲文明而成长的人，在研究任何世界性的历史问题时，都不免会反躬自省：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之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之中，出现了某些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正如我们一相情愿地认为）存在于一条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线索中，这应当归诸怎样的环境因素呢？

仅仅在西方，科学在今天才处于我们公认的真实有效的发展阶段。经验性知识、对宇宙及人生问题的沉思，以及最为深奥的哲学与神学智慧，都不在科学的范围之内。不过，系统神学的全面发展，却应该仰赖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基督教，因为伊斯兰教和一些印度教派神学只是一些片段，不成系统。简单说来，在其他地方也有精准细密的知识与观察，尤其是在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但是，巴比伦以及其他各地的天文学却缺少最早从古希腊传承而来的数学基础（这使得这些地方天文学后来的发展更为令人惊异）。印度的几何学所没有的理性证明，那是希腊人智慧的另一结晶，它同时也创造了力学和物理学。印度的自然科学尽管长于观察，却没有实验方法。如果不去考虑其古老的源头，

〔1〕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该导言是韦伯于1920年为其整个宗教社会学研究所写，是理解所有韦伯著作的关键线索。

后来具有的这种实验方法与现代实验室一样，究其本质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因此，医学，特别是印度医学，尽管有着高度发达的经验技巧，却缺乏生物学尤其是生物化学的基础。所有西方以外的文化区域都不具有理性的化学。

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历史学，却没有修昔底德^{〔1〕}的方法。印度确曾有过马基雅弗利^{〔2〕}的先驱，但印度所有的政治思想都缺乏一种可以与亚里士多德^{〔3〕}相提并论的系统方法，而且，也没有理性的概念。在印度（弥曼差派）^{〔4〕}的所有预言中，在大量的、尤以近东地域为最的法典编纂中，在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法律书籍中，都不曾具有严格而系统的思想逻辑形式，这种思想逻辑形式对罗马法及受其影响的西方法这种理性的法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教会法规的逻辑结构也是仅见于西方。

〔1〕 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71～前400），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他将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坚持求实的原则、研究者必须坚持理智的和批判的态度，提出了“历史就是当代史”、“历史的内容是刚刚发生过的政治事件”的著史原则，他的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奠定了西方史学中政治叙事史传统的基础和基本模式，对此后西方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为“史学之父”。

〔2〕 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其《君主论》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书中以理智的计算式的冷静，剖析了君主国的治理之道。另外的代表作还有《论李维》、《战争的艺术》、《佛罗伦萨史》等。

〔3〕 亚里士多德（Aristototele，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古希腊哲学发展的结果，首次将哲学和其他科学区别开来，开创了逻辑、伦理学、政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独立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对西方文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 弥曼差派（School of Mimamsa），古印度六大哲学派别之一，梵语“弥曼差”（Mimamsa）有思维、考察和研究的意思。弥曼差的哲学，可以说研究婆罗门教义，阐扬吠陀思想的宗教哲学。

艺术领域亦如此。其他民族的音乐器官或许进化得比我们更加敏锐，至少不比我们逊色。各式各样的复调音乐遍布世界各地，乐器合奏以及多声部合唱也存在于其他地方。我们所有合理的音程，早就为人所知并进行过推算。但是，理性的和音，包括对位法与和弦；在三和弦、三和声基础上形成的音符组织法；我们的半音和等音（不是依据空间解释的，而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依据和声学解释的那种）；我们的以弦乐四重奏为核心的管弦乐队以及管乐合奏的组织形式；我们的低音伴奏；我们的记谱系统——它使现代音乐作品的创作与演出成为可能，并使这些作品得以流传后世；我们的奏鸣曲、交响乐和歌剧；最后，我们作为以上诸般表现手段的基本乐器，如风琴、钢琴、小提琴等；所有这些都为西方所独有，尽管作为表现手段的标题音乐、音诗、全音和半音的变化，早就存在于各种音乐传统中。

建筑方面，各地早就采用尖顶拱门作为一种装饰手段，这在古代和亚洲都能见到；尖顶拱门和十字形拱形圆顶的组合，东方人对此也并非懵懂无知。但是，合理地运用哥特式拱顶以分散压力，把它作为各种空间构造的屋顶，最重要的是，将之视为宏伟巨大的建筑物的建筑原则，并延伸至雕塑和绘画领域，成为一种艺术风格的基础，可见于我们中世纪的艺术创作，而其他各地都没有出现这些东西。我们建筑学的技术基础得自东方，但是东方却没有解决圆顶问题，同时也缺乏理性化。将所有经典的艺术类型理性化的进程——在绘画中是合理地运用线条和空间透视——这是文艺复兴留给我们的创造。中国早在古代就出现了印刷术，但是只为印刷而设计，并且只有通过印刷大量复制才得以产生的那些印刷品（以报纸和杂志最为重要），却仅见于西方。各种各样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然存在于世界各地（如中国、伊斯兰），有

的甚或表面上与我们的大学相类似，至少接近我们的学院。但是，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业化的科学研究，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却仅仅存在于西方，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已在今天的文化中占据了支配地位。首先，这对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很是恰切，他们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国家和经济生活的支柱。在此之前，这种行政人员只是偶尔被提及，人们压根儿不会想到这类人对于现在的社会秩序竟会如此重要。当然，行政人员，即便是专业化的行政人员，也是绝大多数社会形态中一个古老的组成要素。不过，没有哪个国家，也没有哪个时代，有过与现代西方同样的状况，即社会的整体存在，其政治、技术和经济条件，绝对而完全地依赖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官吏组织。社会日常生活之中最重要的职能，已经逐渐掌控在那些受过技术、商业、最重要的是法律训练的政府行政人员手中。

封建制度下各阶级的政治和社会群体组织很是普遍。但是，西方意义上的“朕即国家”式的封建制国家却仅见于我们的文化。特别是由定期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的议会，由群众领袖和政党领袖担任部长并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形式，更为我们西方所独有，尽管施加影响并掌控政治权力的政党组织遍布于世界各地。实际上，具有理性的成文宪法，理性地制定而成的法律，以及依据理性的规章或法律，并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进行管理的政府组织，即所有这些要素所组合而成的国家共同体，仅为西方所特有，尽管其他国家的政府组织形式与它极为类似。

影响我们现代生活的最为重大的力量——资本主义，其情形亦复如此。获取、逐利、赚钱、尽最大可能的赚钱，这些冲动本身与资本主义毫不相干。它们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所有人的内心，见之于侍者、医生、马车夫、艺术家、娼妓、贪官污吏、士兵、

贵族、十字军骑士、赌徒、乞丐等人身上。可以说，所有国家、所有时代和所有境况下的所有人，只要具备了或者曾经具备了客观的可能性，全都具有这种冲动。所以，在文化史的启蒙学教育中就应该告诉人们，一定要彻底放弃这种对于资本主义的幼稚想法。对财富的无限贪欲绝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为对这种非理性冲动的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调和。不过，资本主义即等同于通过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活动去追求利润，并且永不停歇地获取新的利润的经济行为。因为它必须如此：在一个彻头彻尾资本主义化了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不能利用机会获利的资本主义企业，注定会销声匿迹。

现在来给我们所用的术语做一个比常规做法更为精细的界定。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定义为：它是一种利用交易机会获取预期利润的行为，它需要依赖（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那种（形式上和实际上）通过强取豪夺而获利的方法，遵循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法则，把它纳入与刚才所分析的以交易获利的行为相同的范畴，是不合适的，尽管很少有人能够避免这种做法。^①在理性地追求资本主义赢利的地方，相应的行为就会根据资本核算加以调节。这表明该行为要系统地利用商品和个人劳务为获利手段，这样，在一个经营周期结束后，企业货币资产的收支差额（在持续经营的情况下，指的是资产的阶段性估算货币价值）应多于资本，即多于在交换中用于获利的物质生产资料的估价。至于是将一定量的商品完全委托给一个旅行商人（其过程可能包括经由贸易全部获得其他商品），还是涉及一个其资产由厂房、机器、现金、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凡此种种，皆可抵偿债务）组成的制造性企业，都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要以货币形

式进行资本核算，不管是用现代簿记方式，还是用其他原始的、粗糙的计算方式。一切都要依据收支差额进行衡量：企业运转之初，有一个初始收支差额；在做出任何决策之前都要进行计算，以确定其大致利润；经营结束后，要计算最终的收支差额，看看得到了多少利润。举例来说，“康曼达”^{〔1〕}交易中的初始收支差额，将决定投入其中的资产的议定货币价值（只要它们不再以货币形式存在），而最终的收支差额将形成一项估价，基于此进行最后的红利分配或损失分担。只要交易是理性的，那么合伙人的每一项行动都要以计算为基础。当然，并不存在真正精确的计算或估价，在不少地方，其方法纯属推断臆测，或是仅以传统的、常规的方式进行，即使在今天，这种情况仍然出现于那些对计算精度要求并不严格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不过，影响所有这些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获利方式的理性程度而已。

界定这一概念意在表明，经济行为要真正适应货币收入与货币支出二者之间的比较，不论其方式有多么的原始粗陋。在这个意义上，只要允许我们对经济文献进行判定，我们就可以说，地球上所有的文明国家中，都存在着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企业，甚至还有相当理性的资本主义计算。无论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古代地中海地区，还是在中世纪和现代都是如此。这些并不只是孤立的商业投机，而是整个地依赖于不断更新的资本

〔1〕 康曼达（Commenda）是流行于中世纪的商事合同之一，合作双方中的一方（出借人）提供货物、货币，另一方（借入人）则以之进行海外贸易，也就是一方出钱，另一方出力，作为回报，后者要向前者支付部分利润，同时，由于后者在海上航行中承担着巨大风险，他通常获得1/4的利润作为报酬。后来，这种商业合同由最初的总是康曼达人（出借人）出资发展成为二者都提供资金，由最初的临时性发展成为一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关系，它孕育了有限合伙制度。

主义经营活动，甚至是持续运转的经济企业。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贸易，并不像我们这样持续不断地进行，它们基本上由一系列单独的经营活 动构成。即使巨商大贾们也是（通过部门组织，等等）在获得内部凝聚力之后，逐渐从事那种商业活动的。总之，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家（不管他是偶尔为之还是坚持不懈）是非常古老和相当普遍的。

然而，如今西方所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不论是就数量和规模上，还是（随着数量的发展）就类型、形式和方向上，在其他各地都没有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商人——进行批发或零售的，从事地方性或国际性贸易的——遍布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贷款早就存在着，还有功能多样的银行，它们至少能与 我们 16 世纪的银行相提并论。海外贸易贷款、“康曼达”、类似于有限和无限两合公司的交易和组织都已普遍存在，甚至成为持续性的行业。无论何时，只要存在公共团体的货币资金，就会出现放债者，像巴比伦、希腊、印度、中国、罗马即是如此。他们为各种战争、海上劫掠、契约和建筑项目筹措资金。在海外政策中，他们成为殖民地企业家，成为利用奴隶、使用直接或间接强制性劳动的种植园主，他们承包领地、行政机构，最重要是税收。他们资助政党领袖竞选，也资助内战中的雇佣兵。最后，他们还是利用各种机会攫取金钱的投机分子。此类企业家，此类资本主义的冒险家，存在于世界各地。除去贸易、信贷和银行交易外，他们的行为主要带有非理性和投机的性质，或者说以通过暴力获利为主，尤其是掠夺获利，不论是采取战争的形式，还是采取剥削属地持续的财政收入的形式。

企业的创办人、大规模的投机者、特许权猎取者此类人的资本主义，以及甚至在和平时 期也存在的非常现代的金融资本主

义，尤其是与掠夺性战争关联的资本主义，都带有非理性和投机的印迹，即使现代西方各国亦是如此。大规模国际贸易的某些部分，不过只是某些部分，也与此有密切的关联，从古至今，一直如此。

不过，除此以外，现代西方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差异巨大的资本主义形式，其他地方从未出现过这种资本主义形式，那就是（形式上）自由劳动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它在其他地方不过是初现端倪。不自由的劳动组织甚至也达到过相当程度的理性化，不过仅限于种植园以及古代奴隶工场这种非常有限的区域内。在封建领主的庄园、庄园作坊和使用奴隶劳作的庄园家庭工业中，其理性化程度就更低。可以确证的是，在非西方地区，使用自由劳动的真正的家庭工业屈指可数。只在极少数情况下——特别是国家垄断经营，但与现代工业组织相去甚远——频繁地雇佣日工才会发展成生产组织，但从来没有发展成为像我们中世纪那种理性的手工业学徒组织。

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有条不紊的市场保持一致，而与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机谋利无关，此外，它也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唯一特点。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如果离开了另外两个重要因素，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的形成也不会成为可能，它们是：一是经营与家庭的分离，这已完全支配了现代经济生活；二是与之密切关联的理性的簿记制度。工作区与居住区在空间上的分离，亦见之于别处，如东方的集市和其他文明中的奴隶工场。在远东、近东地区和古代，也能寻觅到具有自己账目的资本主义联合组织的发展。但与现代商业企业的独立性相比，它们只不过是微弱的萌芽。究其原因，在于这种独立性所必备的条件，即我们的理性的商业簿记制

度，以及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法定的分离，在那里根本毫不具备，或者仅是初现端倪。^②在其他地方，赢利性企业曾有发展成为王室或（领主的）庄园家业的一部分的趋向，正如罗德波特斯所意识到的，这种发展与西方的发展尽管表面上相似，实质上却大为不同，甚至恰恰相反。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所有这些特性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归根结蒂，完全在于它们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密切结合。还有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和投机的理性化、兑换等，皆与此有关。如果没有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凡此种种，即使有可能出现，也不会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社会结构和现代西方与之关联的所有具体问题来说。精确的计算（此乃所有事情的基础）只有以自由劳动为基础才成为可能。

正如（毋宁说因为）现代西方之外的世界并不知道理性的劳动组织，所以他们也就不知道理性的社会主义。当然，世界各地早就有城市经济、城市食物供给政策、君主的重商主义和福利政策、定量配给制度、经济生活条例、保护主义和各种自由放任理论（如在中国）。人们还知道有过各种各样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试验：家庭、宗教或军事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如在埃及），垄断卡特尔，以及各种消费者协会。然而，尽管各地都有市民的市场特权、公司、行会、城乡之间的各种法律差异，但是，西方之外却从未出现过“公民”这一概念，“资产阶级”这一概念也没有出现于现代西方世界以外。同样，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不可能存在，因为它们是没有受法规约束的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诸如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地主和无地者、农奴或佃户之间，商业集团和消费者或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各种各样的组合方式存在于世界各地。但是，就连西方远在中世纪时就发

生的货庄主及其雇工之间的斗争，在其他地方也只是略有萌芽而已。现代西方发生的大工业企业与自由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冲突，在那些地方更是无迹可寻，因此也就不可能会有诸如社会主义之类的问题。

因此，对我们来说，一部世界文化史的中心问题，即使以纯经济的视角来看，也终究不是资本主义活动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在不同的文化中只存在形式上的差异：要么是冒险家型，要么是在贸易、战争、政治和行政管理中作为获利来源的资本主义），而是这种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为特征的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从文化史的角度说，即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起源问题紧密关联，但并不完全一致。因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形态独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之前就已存在，尽管它的确只存在于西半球。

乍看上去，形态独特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受到了技术潜力发展的强力影响。今天，这种资本主义的理性化本质上取决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计算性。不过，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于现代科学的独特性，尤其是以数学和精确而理性的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另一方面，这些科学和以其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的有效应用中，受到了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巨大刺激。诚然，西方科学的起源不能归功于这些利益集团。印度发明了十进制计数法，它早就采用了算术（甚至是十进制计算）和代数学。但是，只有西方才利用它来发展资本主义，而印度却没因它而产生现代算术或现代簿记法。同样，数学与机械学的起源也不是由资本主义利益决定的。不过，攸关人民大众生活质量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应用，的确因经济因素的考虑而得到促进，在西方，